

禀赋效应视角下农民工的承包地处置方式分析

梅淑元

(湖南农业大学 经济学院, 湖南 长沙 410128)

摘要: 基于CHIP2013外来务工住户数据,从农地的重要程度、可替代性以及地权稳定性等方面选取变量,采用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对农民工承包地处置方式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由于禀赋效应的存在,农民进城务工时对农地处置按“留守家庭成员耕种-转包给个人-转给企业或农业大户-撂荒”禀赋效应依次减弱的方式存在差序特征;农民对土地依赖程度越低,农户收入水平越高,土地越容易被替代;土地市场越活跃,土地的禀赋效应越弱,农民倾向于放弃承包地经营权;由于禀赋效应的存在,更稳定的承包经营权与农民工农地处置不显著相关。

关键词: 农地流转;处置方式;禀赋效应;农民工

中图分类号:F32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2013(2018)04-0027-06

Disposal mode of migrant workers' contracted land based on the theory of endowment effect

MEI Shuyuan

(School of Economics,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128,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f CHIP2013 migrant workers, this paper selects variables from the importance, substitutability and stability of land, and mak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rural migrant workers' contracted land disposal by multiple ordered Logistic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ndowment effect gets weak in turn according to the farm land dispose model of left behind family members farming, subcontracting to individuals, transferring to enterprises or agricultural large households, abandonment; the lower the land dependence of farmers, the higher the income level of farmers, the more easy the land to be replaced; the more the land market leaped, the weaker the land endowment effect and the farmers are more willing to abandon the contractual management rights; because of the endowment effect, a more stable contractual management right is not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the farmland disposal of migrant workers.

Keywords: farm land circulation; disposal mode; endowment effect; migrant worker

一、问题的提出

2016年中国农民工总量为28171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6934万人,占比60%^①。农村劳动力在空间上“离地”、在职业上“离农”虽然能促进农地流转,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具有交易收益效

应和边际产出拉平效应^[1],但在中国劳动力非农化流动进程中,人口迁移与土地流转严重不一致^[2],承包地经营权并未因人口迁移而很好地流转,催生了中国特殊的“离农”不“离权”、“弃耕”不“弃地”的扭曲人地关系^[3],导致承包地利用效率不高与农业现代化和人口城镇化双重受阻。因此,农民工进城务工,其承包地如何处置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4]。

农民进城务工以后对农村承包地经营权的处置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他们的承包地可以由其他留守家庭成员耕种,也可以流转给一般农户或者大

收稿日期:2018-01-25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1473080);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7JD40)

作者简介:梅淑元(1978—),女,湖南常德人,博士研究生,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

规模经营者,甚至可以任其荒芜。从已有的数据来看,农户土地流转表现出较大的流转方式和相对人的差异性^[5]。城镇化推进了农民群体内部在职业、收入、物质资产等方面的分化,使得农民对农村土地有不同的生计依赖和产权偏好^[6],形成了对承包地的生产效用、保障效用和财产效用的多重性和效用差序格局的重构需求^[7],从而产生不同的土地处置意愿。已往的研究大多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说,从成本和收益角度解释外出农民工承包地经营权不同处置方式的影响因素^[8,9]。但对于以农为生的农民来说,土地并不是单纯的经济要素,而是被身份化了的人格财产^[10],农民对农地的处置并不是简单的经济物品交易问题,而是能表达情感的产权交易。

根据行为经济学理论,人格化财产存在禀赋效应,即个体对其所占有之物会赋予一种高于市场价值的主观价值^[11],因而在农地流转、整治和征收中,农民对占有物的主观价值和补偿价值存在认知差异^[12,13]。禀赋效应既为农民普遍存在的“惜地”情结提供了一种合理的解释,也为探讨农民工农地处置方式差异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行为经济学视角。已有的研究验证了农地流转中存在禀赋效应,且禀赋效应会抑制农地流转^[10,14,15],但尚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大多以农民工土地流转意愿为因变量,相较而言,对更能真实反映土地禀赋效应的农民工土地处置行为的研究阙如;第二,一般着重单独考察农民工的土地流转行为,而对农民工农地众多处置方式未予关注。鉴此,本研究拟将农民工外出务工后多种农地处置方式纳入统一的框架,并从行为经济学禀赋效应视角阐述农民工选择不同农地处置方式的内在机理及其影响因素。

二、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

禀赋效应指个体占有某物一段时间后,人们倾向给予它更高的价值评价^[16],表现为占有者出让某物品所要求得到的补偿通常比得到该物品所愿意支付的代价多^[17]。禀赋效应表现为不愿意放弃现在所拥有的物品,是“损失规避”的表现,即消费者对等量损失比等量收益产生的心理感受更剧烈^[18]。禀赋效应主要存在于与持有者人格密切相关的财产中。土地作为难以用其他财物替代损失的人格财产,主观价值高,禀赋效应强,因此禀赋效应会抑

制潜在土地交易。千百年来,中国农民对土地的依赖以及复杂的情感在众多的文学作品和学术研究中多有描述。农民存在明显的“恋地情结”,表现出对土地较强的依赖性^[19],表现出一种让土地“在那里”的心理满足感。即使面对人地关系的不断松动以及逐步显现的潜在获利机会,有一部分农民并没有做出积极的响应,他们心目中转出土地所要求得到的补偿远非市场价格能弥补。因此,对于进城务工却仍然保留土地的农民来说,继续持有是防止物品损失的唯一好方法,不交易即是最好的交易,此时土地的禀赋效应尤为凸显。

随着农民兼业化程度和农地交易市场化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农民工选择将土地流转出去,流转的方式和对象以松散的口头方式流转给亲戚朋友为主^[20]。选择流转给与自己有亲缘或地缘关系的农户,实际是一种典型的损失规避行为。当转入方与农户社会关系亲近时,社会关系本身就是一种保障机制^[21]。农地流转给大规模经营者,往往有契约的约束,意味着对农地实际使用的控制权掌握在他人手中,有可能导致土地质量、用途等发生改变的不确定性。即使将土地流转给大规模经营者可能获得更高的收入^[22],但这种损失所造成的痛苦不能通过财物的替代得到减轻,或者说市场上的流转价格尚不能达到农户认为能弥补这种损失的心理预期价格。因此,流转给与自己有亲缘与地缘关系的农户,有需要时可以及时收回,越是高价值的农地越流向熟人,流转收益更多地体现为保障收益^[23];选择将承包地经营权流转给亲友等一般农户的农民比选择流转给大规模经营者体现了更强的土地禀赋效应。土地抛荒也是农民工农地处置的方式之一,抛荒是对农地经营权的搁置,表现出对农地的一种短期无依恋情感。被抛荒的土地一般耕作条件差、耕作成本比较高^[24],相对而言,禀赋效应很低。综上所述,农民工对农地有四种处置方式——留守家庭成员耕种、流转给亲友、流转给大户和企业以及抛荒,对于农民工来说,这四种处置方式的禀赋效应依次减弱,表现出明显的差序特征。

禀赋效应是一种相对稳定的个体偏好,同一物品对不同的持有者而言,其禀赋效应是不同的,即禀赋效应受到个体心理因素和物品特征的影响。就物品特征而言,主要与物品的重要程度及可替代性

相关^[25]。物品的重要程度是影响禀赋效应的重要因素。以农为生、以农为业、以地立命的生存状态及其“恋地”情节会导致的较高土地禀赋效应^[26]。农户在做出土地转出决策时更多关注的是土地转出后的替代性生计问题^[27]，对承包地存在生计依赖的农户既不愿也不能离开土地。农民工及所在家庭对土地的生存依赖越强，土地的禀赋效应则越强，越不会转出土地。因此，提出假设 1：农户对土地的依赖越强，承包地的禀赋效应越强，对农地的处置依“留守家庭成员耕种 - 转包给个人 - 转给企业或农业大户 - 撂荒”倾向于保留土地经营权。

根据收入效应，物品的持有者利用资源较多时，物品越容易被替代，禀赋效应降低^[28,29]。农户收入水平越高，购买其它生计资产的能力越强，承包地的可替代性越强，禀赋效应越弱。对于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而言，卖者不会认为、买者也不会将购买一件商品看作受益，也就是说，损失规避在日常的经济交易中的影响很小^[30]。因此，在更活跃的土地市场，农地流转是一种常态，农民外出务工，对农地的依赖度减弱，农地的人格财产功能弱化，仅承担一般生产要素的功能，此时，农地的禀赋效应弱化。因此提出假设 2：农户收入水平越高，所在地区土地市场越活跃，土地越容易被替代，土地的禀赋效应越弱，对农地处置依“留守家庭成员耕种 - 转包给个人 - 转给企业或农业大户 - 撂荒”倾向于放弃土地的经营权。

如果物品的产权边界不明确，或者产权易于被减弱，那么其参与交易的可能性会被抑制^[31]。地权的稳定性能促进土地流转^[32,33]，是基于产权经济学主流理论将农地交易机制等同于标准化的商品市场交易，假定产权主体对拥有的客体是“冷酷无情”的。但土地对于农民来说是人格化的产品，产权明晰有利于促进产权交易的判断并不完全适用于农地产权流转这一特殊市场的交易情形^[10]。禀赋效应理论考虑了交易行为中所嵌入的心理社会文化因素。Rachlinski 等^[34]认为，禀赋效应的大小与产权有直接的联系，缺乏法律保护的物品产生损失时，禀赋效应较弱；而具有法律保护的物品产生损失时，禀赋效应较强。在中国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下，虽然农民只享有承包经营权，但这是农村土地的一种长期制度，农地经营权依附于承包权。承包权越

稳定，承包地的禀赋效应越强，会强化农民不愿意放弃土地的心理感受。因此，“确权”对农地流转的作用其实是不确定的，有可能是一把“双刃剑”^[35]。更稳定的农地承包权一方面促进农地的流转，但另一方面，明晰的产权能强化农民的行为并增强农地的禀赋效应，抑制农地交易。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3：承包权的稳定性对农民农地处置依“留守家庭成员耕种 - 转包给个人 - 转给企业或农业大户 - 撂荒”的影响不明确。

三、实证研究及结果分析

本研究的实证数据来自于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2013 数据。CHIP2013 的样本来自国家统计局 2013 年城乡一体化常规住户调查大样本库。CHIP 项目组按照东、中、西分层，根据系统抽样方法抽取得到 CHIP 样本，从 15 个省份 126 城市 234 个县区抽选出 18 948 个住户样本和 64 777 个个体样本，其中包括 760 户外来务工住户样本。本研究在 760 户外来务工住户样本中，剔除掉对“户口所在的农村老家住房和承包地情况”这一问题回答为“老家没有承包地”和对承包地处置方式回答不明确以及对相关选项回答不符合逻辑的样本后，得到有效外来务工住户样本 386 个，并从中筛选出户主相关个人信息以及样本家庭总体情况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1. 变量指标和模型选择

外出务工农户对老家农地处置方式是本研究的因变量，在 CHIP2013 调查问卷中，对于“老家的承包地，2013 年末主要由谁在经营？”这个问题的回答，提供了四个选项：留守家庭成员经营、转包给个人、流转给企业或农业大户经营、撂荒。386 个有效样本中，四种处置方式选择样本数及占比依次为 233 (60.4%)、114 (29.5%)、7 (1.8%)、32 (8.3%)。可见，土地流转给大规模经营者的比例较少，土地抛荒现象依然存在，农民工对农地处置表现出明显的差序特征。

农民工及其家庭对土地的依赖程度、土地的可替代性以及农地承包权的稳定性是本研究的重要自变量。本研究选取 CHIP2013 数据中“农民工住家中留守家庭成员人数”作为考察农户对土地的依赖程度，留在老家人数越多，家庭对农业的依赖程

度越大,农户对土地依赖程度越大。本研究从两个方面考察农户土地的可替代性。首先考察的是收入,主要选取三个变量:“户主当年务工总收入”、“外来务工家庭年末可支配收入总额”、“户主对家庭生活水平的主观感知”三个变量衡量收入。第二个要考察的是土地市场的活跃程度,主要选取“外来务工农户老家雇佣一个临时工(小工)一天需要支付的费用”(老家小工工资)为变量,该指标能从供求两个方面体现土地市场的活跃程度。小工工资越高,说明农业劳动力供给相对稀缺,一方面很有可能是由于当地外出务工农民多,土地资源相对劳动力资源充裕,土地流转更为活跃;另一方面,可能由于土地市场交易活跃,大规模农业经营者增加,导致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另外,农村劳

动力市场价格体现外出务工的机会成本,小工工资越高,说明当地收入水平越高,对农业和土地依赖度低,土地市场化程度越高。农地承包权稳定性本研究选取的是“外来务工农户老家所在村最近五年是否进行过土地调整”作为衡量指标。土地承包经营权三十年不变这一政策是法定的,但不少村庄仍然进行着或多或少的土地调整,土地定期或不定期的调整意味着农村土地产权的不稳定^[36]。

参考已有研究,还选取一些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受正规教育年限、婚姻状况、外出务工经历、农户所在区域地形等,其中年龄、外出务工经历、婚姻状况这三个变量是在原CHIP2013问卷的相关问题和选项基础上整理、计算所得。有关变量的详细说明见表1。

表1 变量说明

分类	变量	变量赋值及说明	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承包地经营权处置方式	留守家庭成员经营=1, 转包给个人=2, 流转给企业或农业大户经营=3, 撂荒=4	1.58	0.877
自变量	留在农村的家庭成员人数	单位:人	1.40	1.495
	老家小工工资	单位:元/天	81.01	39.469
	户主年务工收入总额	单位:元	42 258.17	32 314.730
	家庭年末可支配收入总额	单位:元	66 711.24	58 220.470
	对家庭生活水平的主观感知	生活非常舒适,并且有能力支付各种额外的消费支出=1;生活基本舒适,但没有能力支付多项额外的消费支出=2;生活不够舒适,并且没有能力支付一些基本的消费支出=3;不清楚=4	2.22	0.616
	近五年是否土地调整	是=1,否=0	0.13	0.335
控制变量	性别	男=1,女=2	1.20	0.399
	年龄	2013-出生年份	38.01	9.950
	受教育年限	单位:年	9.27	2.628
	婚姻状况	已婚=1,离异或丧偶=2,未婚=3	1.24	0.629
	外出务工经历	2013-第一次外出务工年份	10.30	7.070
	老家所在地形	平原=1,丘陵=2,山区=3,其他=4	1.89	0.913

数据来源:根据CHIP2013(外来务工住户样本)整理所得。

本研究中的被解释变量为农民工农地处置方式。依禀赋效应的不同,四种方式为有序选择变量,即“留守家庭成员经营”、“转包给个人”、“流转给企业或农业大户经营”和“撂荒”四种方式($Y=1, 2, 3, 4$),因此,选择多元有序模型(Ordered Logistic Regression)进行回归分析。Ordered Logistic 模型的一般形式是:

$$Y_i = X_i\beta + \mu_i \quad (i = 1, 2, 3, \dots, n) \quad (1)$$

(1)式中,自变量 X_i 为影响农户承包地经营权处置的因素, β 为参数, μ_i 为独立同分布随机干扰项, i 为样本观测值的个数。

2. 计量结果及其分析

将前述从CHIP2013筛选出来的386份数据,利用STATA11.0统计分析软件,进行多元有序Logistic回归,估计结果见表2。根据回归结果,从四个方面对农民工农地处置差序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表 2 农民工承包地经营权处置的回归结果

变量	系数	标准误	Z统计值	概率值
留守家庭成员人数	-0.495***	0.109	-4.56	0.000
老家小工工资	0.009 63***	0.003 26	2.95	0.003
户主年务工收入总额	-1.54e-05**	7.70e-06	-1.99	0.046
家庭年末可支配收入总额	7.96e-06*	4.35e-06	1.83	0.067
对家庭生活水平的主观感知	-0.547**	0.238	-2.30	0.022
近五年是否土地调整	-0.318	0.407	-0.78	0.434
性别	-0.163	0.345	-0.47	0.636
年龄	0.0441**	0.017 5	2.52	0.012
受正规教育年限	0.048 1	0.054 7	0.88	0.379
婚姻状况	-0.013 8	0.275	-0.05	0.960
外出务工经历	0.013 7	0.019 1	0.72	0.472
老家所在地形	0.468***	0.149	3.15	0.002
临界点估计值 (c ₁)	2.281*	1.323		
临界点估计值 (c ₂)	4.266***	1.347		
临界点估计值 (c ₃)	4.429***	1.349		
观察值数量	300 ^②			
伪R ²	0.148 3			
对数似然值	-235.247 75			
LR统计量	81.91			
LR统计量显著性水平	0.000 0			

*** $p < 0.01$, ** $p < 0.05$, * $p < 0.1$.

反映土地重要程度的指标与农民工农地处置方式显著相关。农民工家庭留在老家的人数与农地处置方式负相关,说明留在家中的人数越多,对土地依赖程度越大,农民越倾向于保留农地经营权。假设 1 得到了验证。

反映收入效应三个指标与农民工农地处置均显著相关。其中户主年务工收入与农地处置方式负相关,而农户家庭年末可支配收入与农地处置方式正相关。农民是以户为单位的经济组织单元和土地利用的决策主体^[37],一个家庭出于分散风险的考虑常采取“强者务工,弱者务农”多样化经营策略^[38]以便更充分利用家庭成员各自比较优势,实现家庭收益最大化^[39]。当只有户主的务工收入较高时,并不必然导致农地经营权流转与放弃;而当整个家庭收入更高时,农户对农业的生存依赖度减弱,农地的禀赋效应减弱,农民更倾向于放弃农地经营权。“家庭生活水平感知”回归结果也验证了这一点。对生活水平的主观感知是基于整个家庭的判断,越是认为生活舒适,并且有能力支付各种额外的消费支出的家庭,抗风险能力越强,土地的禀赋效应越弱,越倾向于放弃农地的经营权。因此,就收入效

应而言,假说 2 从农户视角得到了验证。

反映土地市场的活跃程度的指标“老家小工工资”与农地处置方式有非常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小工工资越高,土地市场越活跃,农地经营权更多用于交易,土地不再是不可替代的人格化物品,禀赋效应下降。土地越容易被替代,农民越倾向于放弃其经营权,验证了假说 2。

反映农地承包经营权稳定性的指标“所在村近五年是否进行过土地调整”与农地处置方式没有明显的相关性,说明产权稳定会加深农户行为认知,禀赋效应抑制土地流转,更稳定的承包经营权对农民处置承包地经营权作用方向不明确,假说 3 得以验证。但从系数方向来判断,所在村五年内承包权不调整的农户更倾向于转出自己的土地以及自由处置承包经营权。

控制变量中,只有农民的年龄和农户所在区域地形与农地处置方式有显著相关性,农民年龄与农地处置方式正相关。年龄较大户主有更强的土地退出风险规避能力,更希望通过退出农地转变城市居民获得高层次的城镇基本公共服务或进城投靠子女,提升未来生活质量^[40]。农户老家地形与农地处置方式正向关,从平原-丘陵-山区,土地资源越稀缺,土地质量越贫瘠,土地对农民生计的重要性越弱,禀赋效应越弱,农民越倾向于放弃农地承包经营权。此外,农民工的受教育年限、外出务工经历、性别与农民工农地处置没有显著相关性,这一结论与其它实证研究大致相同^[2,8,41]。

四、研究结论及其启示

农民工处置农地承包地经营权有留守家庭成员经营、转包给个人、流转给企业或农业大户经营、撂荒等方式,由于禀赋效应的存在,农民工农地处置按“留守家庭成员耕种-转包给个人-转给企业或农业大户-撂荒”禀赋效应依次减弱的方式存在明显的差序特征。利用 CHIP2013 外出务工住户样本数据,对农民工农地处置方式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农民对土地依赖程度越低,土地的禀赋效应越弱,农户对农地处置依“留守家庭成员耕种-转包给个人-转给企业或农业大户-撂荒”倾向于放弃承包地经营权;农户的收入水平越高、土地越容易被替代,土地禀赋效应越弱,农户对农

地处置依“留守家庭成员耕种-转包给个人-转给企业或农业大户-撂荒”也倾向于放弃承包地经营权；由于禀赋效应的存在，农地承包经营权稳定并不必然促进农地经营权的流转。

上述结论对于促进农民工农地经营权的流转具有以下启示：第一，应逐步完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推动农民工融入城市，剥离农民工对土地的依赖感。在城市中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和社会保障的离土农民，才是真正会长期流出土地的人群，只有当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才会彻底的舍地进城。第二，应培育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更完善的土地流转市场一方面有利于削弱目前很多地方政府推动下大规模经营者在土地流转市场的垄断地位，提高农民的在土地市场的话语权，形成正确反映土地价值的交易价格。更高的土地交易价格能弥补农民对土地的禀赋效应，促进土地交易。另一方面，更活跃的土地交易市场能增强土地的可替代性，农民对承包地的禀赋效应减弱，促进土地交易。此外，更活跃的土地市场能增加农民工利用家庭无暇经营的土地获利的机会，减少土地的抛荒行为。第三，应进一步落实土地确权颁证工作，完善农地处置的权益保障机制，同时充分尊重农民工农地处置的主体地位，尊重农民对土地的情感依赖，维护农民在土地处置中的利益。

注释：

- ① 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结果，<http://www.stats.gov.cn>
 ② 观察值数量少于前述有效样本数量的原因是回归分析中自动剔除了变量中有缺失值的样本。

参考文献：

- [1] 姚洋. 中国农地制度：一个分析框架[J]. 中国社会科学, 2000(2): 54-64.
 [2] 杨婷, 靳小怡. 资源禀赋、社会保障对农民工土地处置意愿的影响——基于理性选择视角的分析[J]. 中国农村观察, 2015(4): 16-25.
 [3] 张蔚. 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土地退出机制研究[D]. 重庆: 西南大学, 2011: 1.
 [4] 廖元和. 城市化进程与中国土地制度创新[J]. 经济导刊, 2007(8): 26-29.
 [5] 王立涛. 农户土地流转行为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 农业经济, 2015(11): 114-115.
 [6] 刘同山, 牛立腾. 农户分化、土地退出意愿与农民的选择偏好[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4, 24(6): 114-120.

- [7] 张学敏. 离农分化、效用差序与承包地退出——基于豫湘渝 886 户农户调查的实证分析[J]. 农业技术经济, 2013(5): 44-52.
 [8] 谢勇. 外出农民工的土地处置方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江苏省的调研数据[J]. 中国土地科学, 2012(8): 48-59.
 [9] 苏群, 汪霏菲, 陈杰. 农户分化与土地流转行为[J]. 资源科学, 2016, 38(3): 377-386.
 [10] 钟文晶, 罗必良. 禀赋效应、产权强度与农地流转抑制[J]. 农业经济问题, 2013(3): 6-16.
 [11] Morewedge C K, Shu L L, Gilbert D T, et al. Bad Riddance or Good Rubbish? Ownership and not Loss Aversion Causes the Endowment Effect[J].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2009(45): 947-951.
 [12] 吴诗嫚, 杨钢桥, 赵微. 农地整治项目农户利益损失补偿研究——基于禀赋效应理论的实证分析[J]. 中国土地科学, 2015(11): 8-17.
 [13] 卿志琼. 禀赋效应、财政幻觉和公共政策——拆迁中情绪事件的行为经济学分析[J].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6): 127-136.
 [14] 陈通, 孙亚文, 江雪莹, 等. 风险认知、负面情绪与农地流转意愿抑制——以禀赋效应为中介[J]. 湖北农业科学, 2014(21): 5304-5309.
 [15] 胡新艳, 杨晓莹. 农地流转中的禀赋效应及代际差异[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1): 12-23.
 [16] Kahneman D, Tversky A. 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J]. Econometrica, 1979(47): 263-291.
 [17] Thaler R. Toward a positive theory of consumer choice[J].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1980, 1(1): 39-60.
 [18] Kahneman D, Knetsch J L, Thaler R H. Anomalies: The endowment effect, loss aversion, and status quo bias[J].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1, 5(1): 193-206.
 [19] 普冀喆, 郑风田. 初始禀赋、土地依赖与农户土地转出行为分析——基于 23 省 5165 个农户样本的实证分析[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1): 42-50.
 [20] 李新仓, 于立秋.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土地流转的关联性研究——基于辽宁的实证调研[J]. 改革与战略, 2016(11): 112-115.
 [21] 罗必良, 汪沙, 李尚蒲. 交易费用、农户认知与农地流转：来自广东省的农户问卷调查[J]. 农业技术经济, 2012(1): 11-21.
 [22] 叶剑平, 丰雷, 蒋妍, 等. 2008 年中国农村土地使用权调查研究——17 省份调查结果及政策建议[J]. 管理世界, 2010(1): 64-73.
 [23] 孔祥智, 徐珍源. 转出土地农户选择流转对象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综合视角的实证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 2010(12): 17-25.